

林业管制、情景依赖与制度绩效

张自强 高 岚*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从林业管制选择具有情景依赖性入手,分析了与情景相容的管制选择有利于提升制度绩效,并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林业相关数据(1994—2008),通过构建指标,运用主成分法,在衡量林业管制强度与制度绩效水平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994年以来,广东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林业管制放松是制度绩效提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

关键词: 林业管制; 情景; 相容; 制度绩效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24(2014)01-0074-08

On Forestry Regulation, Scene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ZHANG Zi-qiang, GAO L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the choice of forestry regulation depends on the scen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ly choices compatible with the scene could improve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example, with forestry-related data collected from 1994 to 2008, this paper utiliz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forestry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by constructing indicators. And then,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The result shows an upward trend between deregulation of forestry and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since 1994 and a long-run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However, imbalance exists in the short term. Forestry regul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while the reverse relationship is not yet empirically supported.

Key words: forestry regulation; scene; compatibility;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一、引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放松政府管制,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着力方向,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放松政府管制的同时也需要规则重建。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管制及其放松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被认为管制经济学鼻祖的Stigler(1971)^[1]指出,管制起源于利益集团对政府游说,它为执行者提供了大

收稿日期:2013-11-30 修回日期:2013-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Y084)和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9JDXM79004)

作者简介:张自强(1986—),男,博士生,主要从事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532959728@qq.com; * 通讯作者:高岚,教授,博士,Email:gaolan@scau.edu.cn。

量腐败机会,造成低效率。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对市场调控缺陷的修复而受重视,但管制仍然造就了管制者的判断对商业或市场判断的决然取代,效率受损(Gellhorn,1982)^[2]。Prasad and Kant(2003)^[3]以印度为例,分析了早期的森林资源管理以政府管制下的国有化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森林破坏,而后改革放松了林业管制,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管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取代,但作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图维护良好的经济绩效(卡恩,1988)^[4]。Vanclay(1996)^[5]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以维护森林的生态功能及可持续经营为目的的林业管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此,多数国家对森林管理实行了管制措施。由此,Shleifer(2005)^[6]认为,管制决策是其面临情境因素的函数,内生于其依赖的情景,合理的管制选择需要考察决策情景。制度改革需要不断平衡不同情景下管制强化与放松之间的动态关系,而这一过程在农村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改)中显得尤为突出。

鉴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管制下的农业经营困境,周其仁(1995)^[7]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开始放松农业管制,包产到户的合法化与长期化意味着国家从对农户经济资源管制的大幅退却,以此换取农民的政治拥护,资源管制下的剩余索取权被重新赋予农民。国家对农业、林业生产经营管制的放松满足了情景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与农业、林业发展。何一鸣和罗必良(2010)^[8]利用中国农业经济数据(1958—2005)验证了国家对农业产权管制的放松是农业经济制度绩效提高的动力源泉。姚顺波(2005)^[9]认为,面临中国林业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景,放松林业管制的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林业生产积极性,促进林业发展。

Ostrom(1999)^[10]在分析公共池塘资源(CPRS)如森林的治理问题时认为,森林管制的放松对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有效保护是必要的,而合理的管制选择依赖于复杂的情景因素。国内对于林业管制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现有研究未能对林业管制选择的情景依赖性以及不同情景下管制选择与制度绩效关系的内在机理给予充分考虑。因此,本文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背景,通过理论分析林业管制选择的情景依赖性,利用广东林业经济数据(1994—2008年),在衡量林业管制变量与制度绩效变量的基础之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深化林业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其假说

(一) 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改革历程的视角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农村主要经历了三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的林业“三定”、90年代的林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和21世纪初的新一轮林改。三次集体林产权制度安排呈现出了不同的林业管制水平和改革绩效。

1.80年代初的林业“三定” 农村改革在土地承包到户的 reform 热潮下,以放松林业管制、激发林农生产积极性为制度设计目标的林业“三定”即“分山到户”改革,不仅没有取得“分田到户”农地制度改革的巨大成效,相反却在集体林区出现了滥砍滥伐、毁坏森林的现象^①,林业管制的显著放松又迅速转向管制强化,改革受挫、林业发展受阻^②。李周(2011)^[11]认为,这项制度安排未能充分考虑林业生产特性、要素稀缺的宏观环境、以往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以及既得利益格局等因素,从而导致制度失效。林业管制放松的同时未能做好规则重建,致使这时期林业管制的过度放松未能凑效。

2.90年代的林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国家开始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对集体林经营进行改革,出现了多样化的林业经营方式。鉴于上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国家在放松林业管制上表现谨慎,在维持原有家庭承包的基础上,推行股份合作经营、林地流转和“四荒”拍卖,尽管一定程度上缓解林业经营困境,但仍未能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林业,出现了集体林转变为“干部林”、“大户林”的现象,林农利益受损。李晨婕和温铁军(2009)^[12]认为,这时期试图通过放松林业管制在山

^①我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年)结果显示,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减少18 558.68万 m³,森林蓄积量减少15 942.46万 m³。

^②1987年中央在《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中规定“集体山林没有分的不得再分。”部分地区还出现将分下去的林地又收回来的现象。

区林区内部生成资本的试验,却因与资本极度稀缺的宏观环境不相容而显得步履维艰。在渐进式改革路径下,这时期林业管制放松谨慎而不完整,林业发展缓慢。

3.新一轮林改 新世纪伊始,国家决定进一步推进林权改革,从 2003 年开始在福建、江西等地区试点实施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等为主要内容,林权交易、林权抵押、森林保险等为配套措施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新时期情景因素的全面改善下,林业管制的进一步放松有效激发了林农的生产积极性,改革成效显著。张海鹏和徐晋涛(2009)^[13]对林改试点省份的改革绩效评价得出,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改善情况看,林改取得了良好成效。而后,于 2008 年国家加大改革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时期制度安排下的林业管制放松与改革环境相适,提升了制度绩效。

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伴随着国家对林业管制政策选择的“放松—强化—放松—再放松”的演绎过程,反映出与改革环境相适的管制选择有利于提高制度绩效。基于林改历程的经验分析,可以认为 90 年代以来的林业管制放松整体上有利于制度绩效的提升(表 1)。

表 1 林改历程中的情景特征与制度安排

时期	情景特征	改革阶段	林业管制	改革结果
1981 年—90 年代初	要素稀缺、政策环境不稳、林业不同于农业的生产诉求	林业“三定”	过度放松	改革受挫
90 年代初—2003 年	推进市场化改革,要素稀缺得到缓解、政策逐渐趋于稳定	林业产权主体多元化	逐渐放松	改革缓慢
2003 年至今	市场、政策等各方面因素得到显著改善、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一轮林改	放松	改革顺利

(二) 林业管制选择与制度绩效: 新比较经济学的视角

Shleifer 等人创立的“新比较经济学”中指出,制度安排下的管制选择具有情景依赖性,制度安排的两个极端即“无序”与“专制”构成了制度安排的两个基本情景特征,两者的有效平衡才能实现最优制度安排,因为“无序”与“专制”都需要成本,而且不同条件下成本高低不同。Djankov(2003)^[14]进一步指出“无序”成本(C_{do})与“专制”成本(C_{ds})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消涨关系,“专制”与“无序”制度安排的边际成本随着“专制”与“无序”程度加大而显著增大。因此,以 C_{do} 与 C_{ds} 分别为纵坐标和横坐标勾勒出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即 IPF(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rontier)是凸向原点的(图 1)。

“新比较经济学”的“无序”与“专制”两个概念和“管制经济学”的管制放松与管制强化的基本内核是一致的。Shleifer(1998)^[15]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或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管制放松能大幅减少“专制”成本 C_{ds} 的同时而不会造成“无序”成本 C_{do} 显著增加。但管制的过度放松却会显著增大制度运行的“无序”成本。这为解释 80 年代初林业“三定”的管制放松所引起的滥砍滥伐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而管制放松过慢的制度安排也难以凑效,如 90 年代的林改。但总体上,在发展中国家或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专制”相对更突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制的放松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在 IPF 曲线上随着 C_{do} 与 C_{ds} 的不同可以将不同情景下的制度安排分为四种“私有秩序”、“私人诉讼”、“政府管制”和“完全国有化”,这四种情景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公共控制逐渐增强。IPF 是 C_{do} 与 C_{ds} 的函数即: $IF = F(C_{do}, C_{ds})$, 在给定制度安排最小成本损失 $C_z: C_z = C_{do} + C_{ds}$ 的条件下,则最优制度安排的管制水平应该是直线 C_z 与曲线 IPF 的切点 a 处。U 表示 IPF 曲线的位置与形状,即制度安排的情景, $U = C_{ds}^\alpha C_{do}^\beta$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F(C_{ds}, C_{do})$, 寻找不同情景下,制度安排的管制水平最优解。

$$F(C_{ds}, C_{do}) = C_{ds}^\alpha C_{do}^\beta + \mu [C_z - C_{ds} + C_{do}]$$

$$\begin{cases} \frac{\partial f}{\partial C_{ds}} = \alpha C_{ds}^{\alpha-1} C_{do}^\beta - \mu = 0 \\ \frac{\partial f}{\partial C_{do}} = \beta C_{ds}^\alpha C_{do}^{\beta-1} - \mu = 0 \end{cases} \Rightarrow \alpha C_{do} = \beta C_{ds}$$

因为 $C_z = C_{do} + C_{ds}$, 所以 $C_{ds} = \frac{\alpha C_z}{\alpha + \beta}$, $C_{do} = \frac{\beta C_z}{\alpha + \beta}$ 。 可以得出:

(1) 当“专制”与“无序”均衡时,即在 $\alpha = \beta$ 的初始情景下,最优制度安排存在 $C_{do} = C_{ds}$ 的 a 点处,即维持均衡状态。(2) 当“专制”更突出时,即在 $\alpha > \beta$ 的初始情景下,最优制度安排存在 $C_{do} < C_{ds}$ 的 b 点处,即应该放松管制。(3) 当“无序”更突出时,即在的初始情景下,最优制度安排存在 $C_{do} > C_{ds}$ 的 c 点处,即应该强化管制。

因此,在“专制”程度较大的改革环境下,政府应该放松管制以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Rahman(2012)^[16] 分析发现,许多对自然资源(主要是森林、海洋和草地资源)依赖较强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资源产权管制放松的改革。中国的林改过程也正经历着林业管制的放松,新一轮林改被认为是国家推进林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开端。本文借助于“新比较经济学”关于管制选择的逻辑,认为 80 年代林业改革受挫后,中国的林业“专制”突出,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而 90 年代以来的林业管制放松有利于制度绩效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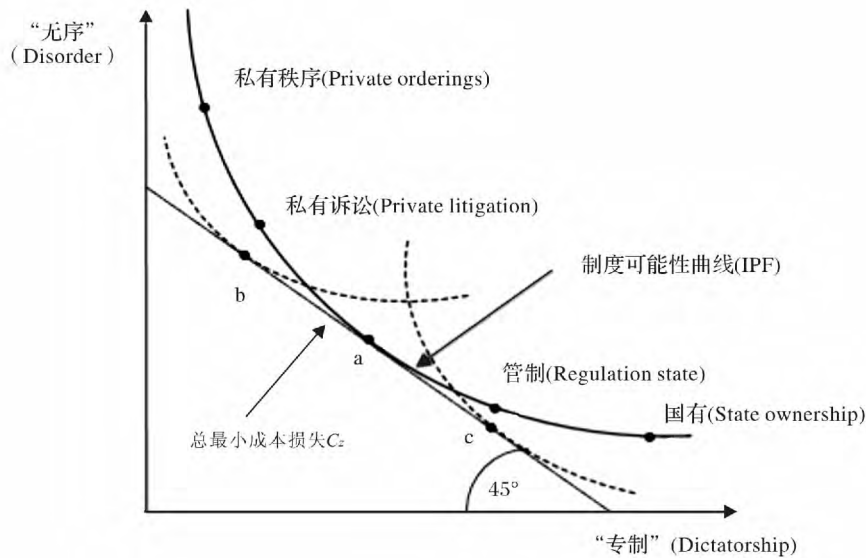


图 1 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rontier) (Djankov et al. 2003)

三、方法、数据与实证分析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 变量的设定 林业管制放松(FR) 的衡量。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林业的市场化改革,以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为背景,逐渐放松林业管制,而 2008 年推开的新一轮林改被认为是林业市场化改革的又一新开端,对此,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段从 1994 年到 2008 年,通过以下几个变量来反映林业管制放松,具体包括:林业系统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X_1)、林业系统从业职工中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X_2)、林业系统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_3)、木材总采伐量中非国有采伐量的比重(X_4)、农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中林业支出的比重(X_5)。其次,制度绩效变量(FP) 的衡量。本文从林业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方面衡量制度绩效,具体指标变量包括:农村人均林业产值(Y_1)、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经营纯收入(Y_2)、农村人均活立木蓄积量(Y_3) 和森林覆盖率(Y_4)。林业管制及其制度绩效的评价所利用的相关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1995—2009)》、《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5—2009)》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995—2009)》。

2. 变量的处理与确权方法 (1) 划定变量得分区间。对林业管制变量进行指数化处理,去掉数据的量纲影响,具体步骤如下:以 1994 年为基期年份,各变量得分的值最大为 10,最小为 0,并且 0 分为下线,10 为上限。(2) 计算变量得分。由于各具体变量都是林业管制放松变量和制度绩效变量的正向指标,其得分: $x_i = \frac{V_i - V_{min}}{V_{max} - V_{min}} \times 10$; 其中 V_i 是某年份第 i 个变量的原始值, V_{max} 和 V_{min} 分别是各分变量所在时

间序列数据中(1994—2008)相对应的最大值与最小值。(3)主成分确权。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变量进行确权,得到 x_i 的权重 f_i (表 2)。各变量确权加总后得到林业管制变量与制度绩效变量的得分值(图 2): $Y_i = \sum_{i=1}^n f_i x_i$ 。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而且对变量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会影响变量原有的协整关系,本文对林业管制变量与制度绩效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分别得到林业管制放松($\ln FR$)和制度绩效水平($\ln FP$)^①。

表 2 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及其权重

变量	X_1	X_2	X_3	X_4	X_5	Y_1 (万元)	Y_2 (元)	Y_3 (万立方)	Y_4
极大值	0.857 6	0.043 1	0.795 8	0.713 0	0.011 9	201.00	34.53	10.35	0.59
极小值	0.007 5	0.004 7	0.151 4	0.509 4	0.000 8	86.89	12.29	5.41	0.55
均值	0.384 7	0.023 1	0.536 7	0.636 5	0.003 4	133.28	22.92	7.52	0.57
标准差	0.262 2	0.016 9	0.244 8	0.070 1	0.002 7	36.29	7.22	1.87	0.01
权重	0.26	-0.03	-0.05	0.49	0.33	0.25	0.21	0.26	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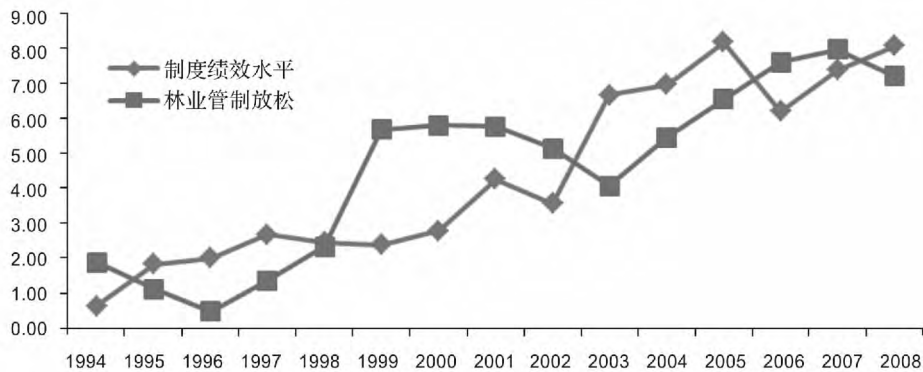


图 2 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

表 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序列	ADF 检验			PP 检验		
	检验值(C, T, L)	临界值	平稳性结论	检验值(C, T, L)	临界值	平稳性结论
$\ln FR$	-1.644 5(C, 0, 3)	-2.729 0*	非平稳	-1.058 5(C, 0, 0)	-2.690 4*	非平稳
$\Delta \ln FR$	-5.193 7(C, 0, 3)	-4.297 1***	平稳	-2.891 5(C, 0, 2)	-3.119 9**	平稳
$\ln FP$	-1.262 5(C, 0, 1)	-2.701 1*	非平稳	-2.866 1(C, 0, 2)	-3.098 9**	非平稳
$\Delta \ln FP$	-6.351 7(C, 0, 0)	-4.057 9***	平稳	-6.778 7(C, 0, 1)	-4.057 9***	平稳

零假设是变量存在单位根, 检验的统计值大于临界值则接受零假设, 说明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 Δ 表示一阶差分序列(C, T, L)中 C, T, L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类型中包含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二) 实证结果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的检验通常采用 ADF 检验和 PP 检验, 当两种检验方法的结果均表明不存在单位根时即平稳时, 才可以判定两变量是平稳的, 否则为不平稳。由表 3 可知, $\ln FR$ 与 $\ln FP$ 序列的水平检验结果均表示“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两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当对两序列进行一次差分后在检验时, 结果显示 $\ln FR$ 与 $\ln FP$ 分别在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说明

^①林业管制放松变量水平的变动并不代表国家管制政策的变动, 这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1998 年后林业管制放松变量处于平稳约有下降的趋势, 这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 到了 2008 年又有下降的现象, 这也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诚然, 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但总体上, 林业管制放松水平呈上升趋势。另外, 从 1994—2002 年的制度绩效水平变化也基本验证了前文的经验分析。

两序列在一次差分后平稳。因此,可以判定各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即 I(1) 过程。

2. 协整分析 两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皆为一阶单整过程,即 $\ln FR \sim I(1)$ 、 $\ln FP \sim I(1)$ 。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假设,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由 EG 两步法和 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本文采用后一种检验方法,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即 VAR 模型来确定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构建一个 $\ln FR$ 与 $\ln FP$ 两变量的 VAR 模型,通过 Lag Length Criteria 试验可以判断,根据 LR、FPE、AIC 和 SC 准则所选取的滞后期均为 4,由于协整检验滞后阶数比原序列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少一阶,所以选择滞后阶数为 3 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表 4),在 5% 的显著水平下变量 $\ln FR$ 与 $\ln FP$ 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即表明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 4 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

原假设 (协整关系)	迹检验			最大特征值检验		
	统计量	临界值	相伴随概率	统计量	临界值	相伴随概率
无	71.6438**	12.320 9	0.000 0	71.393 9**	11.224 8	0.000 1
至多一个	0.250 0	4.129 9	0.676 3	0.250 0	4.129 9	0.676 3

** 表示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3. 误差修正模型 由表可知,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一步分析两者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 $\ln FR$ 与 $\ln FP$ 的长期均衡关系式为:

$$e_t = \ln FP_t - 0.578 3^* - 0.541 3 \ln FR_t^{***} \quad (1)$$

(2.130 9) (3.063 7)

$\ln FR$ 与 $\ln FP$ 一阶差分序列分别为 $\Delta \ln FR$ 和 $\Delta \ln FP$,将 e_{t-1} 带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得到:

$$\Delta \ln FP_t = 0.042 6 \Delta \ln FP_t - 0.467 9 e_{t-1}^{**} \quad (2)$$

(0.231 7) (-2.705 0)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ln FP$ 的变动主要通过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来反映,短期内系统对于均衡情景的偏离程度决定了波动幅度,主要由解释变量 $\ln FR$ 的短期波动和均衡误差 e_{t-1} 来解释。 e_{t-1} 为调整系数,表示对 $\ln FP$ 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结果显示,在长期均衡关系式中 $\ln FR$ 对 $\ln FP$ 的系数估计值为 0.541 3,即林业管制放松对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在误差修正模型中 e_{t-1} 的系数估计值为 -0.467 9,为负表示符合反向修正原理,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 46.79% 的调整力度将 $\ln FP$ 的非均衡情景拉回均衡情景。因此,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4. Granger 因果关系分析 对滞后 3 期时 $\ln FR$ 与 $\ln FP$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水平之间存在单向关系,即林业管制放松是制度绩效提升的 Granger 原因(表 5)。可见,林业管制放松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绩效提升并没有促进林业管制放松,原因在于林业管制放松不单是一个经济命题。

表 5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概率	结论
$\ln FR$ 不是 $\ln FP$ 的 Granger 原因	3	4.120 6	0.080 7	拒绝
$\ln FP$ 不是 $\ln FR$ 的 Granger 原因	3	0.814 9	0.538 3	接受

(三) 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林业管制放松的选择与情景因素相容,对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林业管制下的租值耗散。租值耗散可以理解为是效率或绩效的损失,巴泽尔(1997)^[17]认为,资源的租值耗散是由于资源产权权利的部分内容被置于“公共领域”之内,人们竞相攫取“公共领域”内的租值需要相应的资源耗费,从而导致租值耗散。80 年代林业“三定”改革的受挫使国家转而强化林业管制,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林农林权的模糊与残缺。林地产权残缺,未得到完整、清晰的界定,从而使得一

些价值以“租”的形式存在于“公共领域”(刘璨、吕金芝 2007)^[18]。国家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如收税、收费等)对资源进行垄断或管制^①,人为制造“公共领域”导致租值耗散。另外,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导致租值耗散。管制是由于利益集团向政府游说以获得资源垄断下的租金,寻租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李周(2008)^[19]认为林业“三定”制度安排的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行为。林业管制下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与寻租行为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生产性行为努力,有损制度绩效。

其次,林业管制放松与激励相容。“生态保护、林业发展与林农增收”作为新一轮林改目标,表现出对各个层面利益的兼顾。在宏观层面上,中央更加偏重于林业所具有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中观层面上,地方更加注重林业发展及农村稳定;微观层面上,林农则更在意改革的现实收益。由于生态的长期保护需要以林业发展为支撑,而林业的持续发展又会对林农生产积极性提出要求,林业管制放松下制度安排赋予了林农更完备的林业产权,降低了“公共领域”下的租值耗散,从而提高了林农生产积极性。林业管制放松在满足林农增收的生产性诉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需要,形成一种利益相容的局面,即林业管制放松具有 Olson(1982)^[20]所说的“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林业管制放松下的激励相容能够有效降低制度安排与执行成本,提高制度绩效。

四、结论

在宏观层面上,“无序”与“专制”两个维度勾勒出了制度安排的行为情景,这两种维度都会产生各自的行为成本,而制度安排也总是“无序”成本与“专制”成本的函数,在一定情景下,能使“无序”成本与“专制”成本总和最小的管制选择被认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本文将这一逻辑框架引用到我国的林业管制政策分析,认为在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面临的环境下,林业管制的放松将有利于制度绩效的提升,并以广东省为例,利用相关指标衡量林业管制强度和制度绩效水平,通过实证分析林业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4年以来林业管制强度与制度绩效起伏不定,但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林业管制放松能够对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就林业管制放松对制度绩效的促进作用进行解释,认为林业管制放松不仅能够降低管制下的租值耗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且能够赋予林业生产经营者更完备的林业产权,从而提高生产积极性,实现各群体利益相容。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因素有很多,林业管制放松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的分析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林权改革绩效的起伏,为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创造一个讨论的空间。第二,从 IPF 曲线上的制度安排来看,管制放松本身有一个“度”的标准,即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的管制放松才有利于经济发展。从林业的外部性特征及战略地位看,林业管制放松对“度”的要求更突出。第三,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与林业改革很可能是由于两者管制的初始情景不同即 IPF 曲线不同,采取相同的管制放松程度而产生绩效差异。第四,管制的放松可能具有结构性,放松选择的不同,绩效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这可能为全国各地区在新一轮林改中所呈现出的差异化改革绩效提供了一个解释维度。

参考文献:

- [1] Stigler G.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1): 13-21.
- [2] Gellhorn E, Pierce J. Regulation industries [M].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1982.
- [3] Prasad R, Kant Shashi. Institutions, forest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experiences from India [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03, 5(3): 353-367.
- [4] 卡恩. 管制经济学: 原理与制度 [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8.
- [5] Vanclay J. Estimating sustainable timber production from tropical forests [J]. CIFOR Working Paper, 1996(11): 25-37.

^①林业“三定”改革的受挫使国家重新实施林业管制,包括严格的采伐制度与林业税费。据调查,南方集体林区部分地区的林业税费甚至超过了50%。

- [6] Shleifer Andrei.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5, 11(4): 439-451.
- [7] 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 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下)——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J]. *管理世界*, 1995(4): 147-155.
- [8] 何一鸣, 罗必良. 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证据(1958—2005年)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10): 4-15.
- [9] 姚顺波, 郑少锋. 论激励性林业管制 [J]. *林业经济问题*, 2005(2): 87-90.
- [10] Ostrom E. Coping with tragedies of the commons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19(2): 493-535.
- [11] 李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评价与思考 [J]. *林业经济评论*, 2011(1): 33-41.
- [12] 李晨婕, 温铁军. 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1980年以来林区三次林权改革“分合”之路的制度变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09(6): 33-42.
- [13] 张海鹏, 徐晋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动因性质与效果评价 [J]. *林业科学*, 2009(7): 119-126.
- [14] Djankov S, Glaeser E, Laporta R, et al.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4): 595-619.
- [15] Shleifer Andrei. 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4): 133-150.
- [16] Rahman H, Gordon M, Swapan K.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dynamics under a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of decentralization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8): 32-41.
- [17]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8] 刘璨, 吕金芝. 我国集体林产权制度问题研究 [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7(1): 80-104.
- [19] 李周. 林权改革的评价与思考 [J]. *林业经济*, 2008(9): 3-8.
- [20]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责任编辑: 黄平芳, 英摘校译: 吴伟萍)